

吴永喆
乔万民
选注

苏轼

唐宋八大家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吴永喆
乔万民
选注

苏轼

唐宋八大家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苏轼 / 吴永喆, 乔万民选注.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12

(唐宋八大家)

ISBN 978-7-80696-368-5

I. ①苏… II. ①吴… ②乔…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北宋 IV. ①I26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1712号

唐宋八大家·苏轼

乔万民, 吴永喆/选注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88 千字

2010 年 9 月 第 1 版 2016 年 2 月 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80696-368-5 定价: 19.00元

苏轼生平及创作简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旷世奇才。

苏轼的父亲苏洵，字明允，二十七岁才开始发奋读书，屡试落第后，曾愤而烧毁自己的文章，再度悉心攻读，最后，终于成为一代著名的古文家。苏轼有一个哥哥叫景先，很早就死了。他的弟弟叫苏辙，字子由，一生中，与苏轼荣辱与共，他们不仅是亲兄弟，也是文学上的挚友。正如苏辙所说的，苏轼对他是“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轼一家父子三人，在文学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后人并称他们为“三苏”。为区别起见，又分别称之为“老苏”“大苏”“小苏”。

苏轼八岁时入乡校读书。他的老师张易简为天庆观道士。当时学生有近百人，这位老师却单单赏识苏轼和另外一个叫陈太初的学生。那位陈太初后来成了一个怪人，也通过了科举，后来没有走仕途，却成了道人。而苏轼的一生，却与这位得道的少年同窗大相径庭，终生毁誉相伴，大起大落。

苏轼在童年就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的文学才华。他的家乡四川眉山有一位学者名叫刘巨，当时在郡城之西寿昌院教授学生，所授至百人，苏洵命苏轼、苏辙兄弟师之。苏轼时尚幼，听刘巨赋《鹭鸶诗》最后的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从旁说：“先生诗佳矣，窃疑断章无归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刘巨听后惊说：“我怎么敢当你的老师呢？”一次，苏洵命苏轼和苏辙作《夏侯太初论》。夏侯玄字太初，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臣。当时，司马师继其父司马懿之后夺权篡政，自任大将军。夏侯玄参与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不料事泄被捕。临刑前夏侯玄颜色不变，镇定自若。据《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夏侯玄这个人平时处事即镇定得出奇。一次，他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樵燃，神色不变，书亦如

故。苏轼借这段记载展开评论说：“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蛰。”极力形容人们在无思想准备时的不同表现，从而盛赞夏侯玄的临死自若与他平素的处事不惊是种常人难及的雅量。这两句话，初次显露了苏轼的随机生发，翻空出奇的雄辩才能，得到了苏洵的极大赞赏。

苏轼十多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到外地求官游学，这时，他的母亲程氏为他讲授学业。程氏出身高贵，很有文化教养，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尤其注重对苏轼如何做人的教育。有一次，她给苏轼讲《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名士，他坚决反对当时的宦官专权误国。汉灵帝建宁二年，在宦官操纵下的朝廷大肆逮捕名士党人，范滂镇定自若地前去投案，当时的一些正直官员都非常同情范滂，但亦无奈。他的老母与其诀别时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李、杜都为当时名士集团的领袖人物），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苏轼母子俩讲到这儿都很激动，苏轼对母亲说：“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氏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这种做人要讲正义、求公理的品操对苏轼很早就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奠定了他以后一生的品行基础。

苏轼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宋仁宗庆历年间。那时的宋仁宗正锐意改革，撤换了以吕夷简、夏竦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大臣，起用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物，政局焕然一新。当时一位叫石介的国子监直讲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加以颂扬。苏轼常常诵习之，对韩、范、富、欧阳四位“人杰”产生了十分强烈的仰慕之情，立志将来也如此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宋仁宗嘉祐元年，即公元1056年3月，苏轼兄弟随父亲离开老家四川眉山，赴京应考。他们从陆路走，经阆中（今四川阆中）、褒斜（今陕西勉县北），过秦岭、关中，最后于当年的五月抵达汴京。经过几个月紧张准备，同年八月，苏轼、苏辙兄弟俩在开封府同时考中了进士。按照宋朝当时的规定，府试以后还要通过中央礼部（负责祭享、礼仪、贡举的机关）的考试。之后，还要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苏轼、苏辙兄弟在开封兴国寺准备下一步的应考，而其父苏洵则投书当时在朝廷居于显位的欧阳修、富弼、韩琦等人，立刻受到赏识。到了第二年的正月，欧阳修以礼部侍郎（礼

部的长官)主持考试。欧阳修为文,主张平易流畅,而对当时较为流行的奇诡艰涩的文风很不满意。所以,他主持考试,就把文风是否平易流畅作为取士的标准,苏轼的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欧阳修的特别赏识。据载,欧阳修看完他的文章不觉汗出,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书》)苏轼的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旁征博引,气势飞扬,但在引用的史例上,却有一则是杜撰出来的。他在文中畅言:奖赏可失之过宽,而处罚若有疑问则应慎刑,以免错杀无辜。在这里,他用了一则典故,说:“唐尧时代有一个人即将被判死刑。皋陶曰:‘杀之’,尧曰:‘宥之’。”这则典故用得很好,也能支持他这篇文章的论点。考官读到这则典故,不敢质疑,怕被人认为才疏学浅。苏轼过关后,有一天,考官之一的梅尧臣问他关于尧帝和皋陶的事典由何出?苏轼莞尔一笑,说是想当然杜撰出来的,他认为圣君一定会这样做。这件事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段趣话。经过礼部的考试之后,苏轼兄弟又通过了仁宗皇帝的“御试”。苏轼赐进士及第,在三百八十位考中的学子中名列前茅;苏辙赐同进士及第。宋仁宗私下里曾高兴地对皇后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

正当苏轼准备步入政坛之际,噩耗传来,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家病逝,苏洵父子只好回家奔丧。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氏父子三人守丧完毕,带着他们的家眷举家前往京师。苏轼在第一次进京应考前,就与家乡的一位名叫王弗的女子完婚。“王弗年十六,其始,未尝自言知书,见苏轼读书,则终日不去。其后,苏轼有所忘,王弗辄能记之”。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王弗始终伴随在苏轼身边。

这次赴京,苏氏父子走的是水路,他们经现在四川境内的嘉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夔州出了三峡,及至今天湖北江陵时,已是岁末。一路上,他们饱览了长江上的秀丽景色,见到许多他们早已向往的名胜古迹,如屈原墓、八阵图、神女庙、昭君村、黄牛庙、虾蟆坟等,每一处山川名胜都激起了他们的诗情万千,父子三人沿路写下了不少诗歌作品。为了纪念这次长江之行,他们就把途中所作的诗一百首,编为《南行集》。这其中苏轼的四十首诗成为他现存最早的作品。严格地说,这时苏轼的诗还处于

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但苏轼在这部《南行集》的序中所写的一段话却受到后人的极大重视。这篇序文是他们父子三人到了江陵后在驿站中写的，其中说：“夫文之为文者，非能为之工，乃不能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不是“能为之”而写出来的，而是“不能为之”所写出来的。意思是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有感而发，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苏轼的这一理论贯穿了他整个一生的创作。

苏洵父子三人到达江陵后，就由水路改为陆路北上，嘉祐五年（1060）二月，抵达汴京。苏轼全家在宜秋门附近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来。苏轼兄弟通过了两次考试，前一次是考京师各部的公务，通过后，朝廷授苏轼河南福昌县主簿，未赴任。原因是他准备与弟弟苏辙一起参加稍后朝廷举办的“制科”考试。

在唐宋时期，朝廷除经常性地举行“进士”“明经”类的考试外，还有一种由皇帝下诏举行的特别考试，称作“制科”。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八月，宋仁宗亲自到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苏轼考入第三等，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誉。第三等为上考，从宋初以来，被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整个北宋也只有四个。这次考试之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考入了第四等，被任为商州推官。这时，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得到朝廷的任用，在京修礼书。苏辙请求朝廷后留京侍奉父亲，苏轼前往凤翔任职，苏辙送哥哥到郑州分手。第一次远离，兄弟都不免有些感伤。苏轼作诗一首写道：“……寒灯相对忆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情勿苦爱高官职！”苏轼虽然在诗中说兄弟长相守要比追求高官厚禄强，但在当时，他对仕途还是充满勃勃雄心的。

凤翔位于陕西西部，傍近渭河。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整个渭河流域充满了古老的文化色彩。不过，在苏轼到任时，这里和甘肃南边逐渐兴盛起来的西夏不断发生冲突，弄得财力匮乏，民生凋敝。苏轼到任之后就遇上了一场罕见的旱灾，而求雨是地方官的事，苏轼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心。他亲自来位于渭河南部的秦岭，爬到秦岭的最高峰太白山。那里的一座道观前有一个小池塘，据说龙王就住在那里。苏轼在那里挥

笔写了一篇祈雨文，接着又到各处求雨。也许上苍为苏轼的诚心所感动吧，就在他祈雨不久，当地果然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四野遍泽，民众雀跃欢呼，苏轼为此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著名的碑记。

苏轼入仕之初的北宋已经出现了种种危机。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宋仁宗于庆历三年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号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厚农桑”“修武备”等十项治国方案。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方案，并在全中国颁行。但事隔不久，由于众多人的反对而宣告失败。范仲淹、富弼被罢去官职，韩琦放出京城，到外地任职，“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而这时，王安石的变法也正在酝酿之中。

这一时期，苏轼的基本思想是要求变革，集中体现在他在考取“制科”时所写的《进策》中。《进策》是一部论文集，包括总论性质的《策略》五篇，阐述具体改革措施的《策别》十一篇，讲述对待西夏问题的《策断》三篇。另外，苏轼在凤翔任上还著有《思治论》，也是代表他这一时期思想活动的重要著作。

在上述的这些文章中，苏轼尖锐地指出现今社会远非什么太平盛世，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他在《策略》一文中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这就相当透彻地指出“内忧外患”之间的主次关系。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苏轼提出了一整套方案：“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在这四大项总纲下面，又分别列出了一些具体措施。这些策论反映了当时苏轼积极参与政治，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的心态。

宋仁宗死后，英宗继位。苏轼于英宗治平元年十二月由凤翔任上返京。

新皇帝英宗久闻苏轼大名，准备破例升他为翰林，替皇帝起草诏命。当时韩琦为宰相，认为突然给苏轼以高位未必是好事，便加以反对。苏轼只好经过考试，授官直史馆（编修国史的官员）。在这个位置上，苏轼有机

会看到了皇室收藏的珍本名画，感觉很满意。

这年五月，苏轼的夫人王弗去世，时年二十六岁，留下了一个六个月大的儿子。苏轼与夫人王弗的感情甚深，十年后，苏轼曾写了一首词来深切怀念这位亡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低徊婉转，文意凄绝，为历代人所叹赏。

苏轼夫人王弗死后的第二年，父亲苏洵又去世。苏轼与弟弟苏辙带着父亲与王弗的棺材从水路返回四川老家眉山，并在家中为父亲守丧。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轼守父丧毕，从老家出发赴京。从这次以后，苏轼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苏轼此次到京，很快就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党争之中，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坎坷异常，大起大落。

这一年的二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运动。王安石曾长期任地方官，在他的任职范围内曾推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他以后的变法做了铺垫。仁宗嘉祐三年(1058)他写下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奏折，系统阐述了他的变法理论和方案。神宗继位，王安石得到了重用。上任伊始，他立即组建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推行新法的机构。

王安石新法的具体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等。王安石还大胆改革科举制，以便为他的新法提供一些他所需要的人才。

王安石变法一经推出，立刻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元老重臣站出来反对。随后，在朝廷中居有重要位置的一些人也出来反对，逐渐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并得到了仁宗妻曹后、英宗妻高后、神宗妻向后的大力支持，反对派在人数上远远超过王安石的变法派。苏轼在这时期属于反对派的骨干。

苏轼由四川守父丧返京后，担任了殿中丞、差判官诰院、权开封府推官等官职。宋神宗熙宁二年五月，苏轼写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

由诗赋取士改为以经义论策取士的做法。半年之后，他又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逐一进行了驳斥。他认为新法好比“毒药”，“今日之改，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他恳请神宗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他劝告皇帝“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但苏轼并非对一切新法都反对，例如他对裁减皇族恩例、勘定任子条式、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等改革措施是大力赞同的。

朝廷中激烈的变法和反变法的争斗使苏轼感到很不适应，加之有人弹劾他在守丧期间参与了贩卖私盐等事，苏轼感觉朝廷不宜久留，要求到地方任职。

苏轼在京城这一段时间里，党争激烈，使他穷于应付，在文学创作上几乎无可称道。在这二三年里，他作诗不足二十首，而且大多是应酬之作，难免泛泛平庸。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终于摆脱了党争的漩涡来到杭州任通判(知州的助理)。在杭州，他和知州陈襄的关系相处得很融洽。陈襄修复钱塘六井，解决了当地百姓饮水难的问题，苏轼就写下了《钱塘六井记》大加颂扬。常州、润州等地发生灾荒，苏轼曾前往“赈济”。临安、于潜等地出现蝗灾，苏轼也前往监督捕蝗。在与民众的接触之中，苏轼亲眼看到王安石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对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苏轼任通判，主要是会审判案，他知道被捕的人中，许多都是因生活所迫而违犯了新法的百姓，因而对这些犯人十分怜悯。他作诗写道：“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囚……我之恶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然愧前修。”他给弟弟苏辙的一首诗中，更道出了他的真心话：“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苏轼对新法感到不满，对新法带给民众的苦难又束手无策，只好移情山水，放纵冶游。在杭州的这一段时间里，苏轼写下了大量吟咏山水的名篇佳句。《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望海楼晚景五绝》《有美堂暴雨》《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调任密州太守，到任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蝗

灾，苏轼上书朝廷，恳请减免科税。他诚心诚意地斋戒吃素，为百姓乞求。由于连年饥荒，许多儿童被弃置道旁，苏轼就采取措施找人收养这些弃儿，官府每月补助这些家庭一定的粮米，这样救活了几千人。苏轼本人也曾亲自沿城墙捡回过一些孩子，每次都痛楚地洒下了泪水。在密州，苏轼忙于赈灾，公事繁忙，生活清苦。看到百姓生活的惨状，苏轼深感内疚。这位饱学儒家经典的地方官发自内心地叹息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表达了他对百姓深切的同情和深深的无奈。

苏轼的词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发展，自立门户，独创一家，初步形成了豪放的词风。

熙宁九年(1076)底，苏轼奉诏离开密州，被派往山西的河中府任职。第二年一月，他由济南进京。当时他弟弟苏辙一家就住在济南，苏轼准备顺便看望一下弟弟，不想苏辙已带着一份重要奏折进京去了。兄弟俩终于在京城附近见了面，算来他们已有七八年没见了。他们二人在雪中畅游了几天后抵达京师。不知为什么，苏轼未被允许入京，不久，被改派为徐州太守。

徐州是一座大城，控制着山东南部的山区，这里在古时曾发生许多大的战役。苏轼到任刚刚三个月，这里就发生了大水灾，黄河在徐州以北五十里多处向东泛滥。大水到达徐州，被南面的高山挡住，水位不断上涨，最后涨到二丈八尺。苏轼后来写诗描述了当时水势浩淼的情景：“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鵬鯨。”当时百姓乱作一团，而苏轼作为太守这时却表现得异常坚定。他在城上盖了棚子，几次过家门而不入，坚定地说：“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洪水围城近两个月，苏轼率领军民昼夜奋战，终于挡住了洪水，保住了徐州城。后来，朝廷下了一道公文，表彰了苏轼的功劳，并应苏轼的请求，拨款派人在徐州城东南建了一道木坝，以防水患。苏轼在这道坝上建了一座十丈高的楼台，叫“黄楼”。后来他在这里写的诗集就叫《黄楼集》。黄楼建成的那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典礼，百姓倾城而出，苏轼与百姓共同庆贺抗洪的胜利，并撰文以作纪念。苏轼在徐州任上还组织民众开发当地大量储藏的煤、铁、石灰等矿产，想方设法解除民众的贫困，他还曾亲自到监狱看犯

人，并派去医生为患病的犯人进行诊治。

苏轼政绩卓著，他的名望也在不断增高。欧阳修死后，苏轼实际上已成了全国公认的第一大学者，许多颇有建树的学者都争先拜他为“师”。拜在苏轼门下的张耒、晁补之、秦观、黄庭坚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后来都成了文学史上的知名人物。苏轼在淮阳结识了张耒，在杭州认识了晁补之。苏轼在徐州，先认识秦观，他写诗给苏轼说：“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他将苏轼比作“天上的麒麟”，还赞扬苏轼的为人说：“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秦观是一位著名的浪漫派文人，他写的词在北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一直没有科名，却赢得了许多青楼名妓的倾心赏识。据说他死后，有一些名妓还为他殉情。野史和一些传说中曾说娶了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但史无明证。

苏轼的另一位门生黄庭坚博学多才，文静内向，他与秦观不同，没有亲自来见苏轼，只是写来两首小诗自荐。这两首小诗写得很谦虚，把苏轼比作崖顶的孤松，而把自己比作谷底幽草，希望自己能长到与孤松一般高。苏轼读过黄庭坚的诗，非常赏识，“以为非今世之人”。他给黄庭坚回信说：“今者辱书，执礼甚恭，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两人交往益深。在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居长，时人把苏黄相提并论，但黄庭坚始终以苏轼门下士自居，后来黄庭坚成了江西诗派的鼻祖。

苏轼常以提携推选后进为己任，他在一篇书信中写道：“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贫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意思是说，他一生到处碰壁，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情，唯有选拔后进才是平生大快事。据《师友谈记》中记载，苏轼对门生说：“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欧阳修）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苏轼是得到恩主欧阳修赏识提拔而名闻天下的，苏轼也就时时以欧阳修为榜样，以选拔后进为己任。同时，希望他的学生们也能像欧阳修和他一样发现人才，推举人才，保证一代文学“其道不坠”，发扬光大。

苏轼久负盛名，在当时堪称文学泰斗，但他胸襟宽广，从来不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尊重别人各自的艺术风格。当时，苏轼和黄庭坚并称于世，人称“苏黄”，但他们二人的诗风有很大差别。古代的一位评论家赵翼说：“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无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尽管如此，苏轼对黄庭坚的许多诗还是持赞赏态度的。秦观是婉约派词风的代表人物，苏轼对他一直是赞赏有加。在秦观的诸多词中，苏轼最欣赏的是《满庭芳》，并取这首词中的首句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秦观死后，苏轼伤感不已，特意将秦观所作词《踏莎行》中的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写在了扇子上，由衷地感叹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苏轼的门人晁补之、张耒在比较苏轼与秦观的作品时说：“少游诗似小词，先生（指苏轼）小词似诗。”对苏轼的词似有批评之意，苏轼听了也“不以为忤已”。

苏轼对许多去世的文友念念不忘，感情深挚。元丰二年，苏轼已调任湖州知州。一天，他拿出自己所收藏的书画放在院子里晒太阳，其中有一幅画是他的表兄、当时著名画家文同赠给他的《筧簞谷偃竹》。那时，文同已去世将近半年，苏轼睹物思人，忍不住痛哭起来，写了《文与可画筧簞偃竹记》，除了追忆朋友间难忘的友谊外，还写了下面一段文字：“故画竹必先得感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后来，“成竹在胸”一语就流传开来，最后变成了成语。

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为官，离开了朝廷无尽无休的党争，使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取得了一系列斐然的政绩。同时，由于他视野开阔，深入生活，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一场始料不及的政治迫害，降落到了他的头上，使他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苏轼长期在地方任职，远离朝廷，而朝廷内部的倾轧却一直连续不断。

从宋神宗熙宁二年到元丰八年，朝廷一直在推行王安石变法，这期间，王安石被两次罢相，最后这次罢相，宣告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王安石新法在推行中一直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扰民越来越甚，苏轼在外地任

职期间,对新法基本是持抵触和否定态度的。他在密州时写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提到:“方田均税之患,行道之人举知之”,“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奇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尽管如此,苏轼还能利用新法中有利的一面为百姓办些好事。他在杭州任通判时,“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在密州,他施行免役法时用“宽剩钱”来购买民田,招募役人,“民甚便之”。苏轼为人,口无遮拦,他认定“世间无恶人”的理论,对谁都心不设防,见到有不满意的事情必“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对新法的不满,他除了上书责难外,还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希望有补于国。在外地任职其间,苏轼写了不少讽喻诗,矛头直指新法的流弊,而苏轼的诗名又很大,每有新诗出,则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朝廷中的一些当权者对他恨之入骨,终于引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由苏轼的一篇谢表引发的。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奉调到湖州任知州。当时王安石已被第一次罢相,王安石门下的一些人窜升到朝廷中的一些重要位置。王安石推行新法,流弊甚多,但他为人还很正直,而后来的这些人却都心怀叵测,专以勾心斗角、结党营私、陷害他人为能事。苏轼一直上表给皇帝,皇帝每次读完他的奏表,都对朝臣公开赞赏,而一些当政小人却极力阻止苏轼入京。苏轼到湖州任后,写了一篇给皇帝的谢表,其中一些话颇令当权的人难以忍受。苏轼写道:“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行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在王安石的口中是指那些“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那个时代,这两个字的含意就固定下来了。当时,朝中的告文都公开发行,苏轼的这篇谢表也在其中,立即引起朝野哗然。那些当权的“新进”如鲠在喉,必欲置苏轼于死地。

元丰二年六月,有一个御史摘取苏轼谢表中的四句话,告他讽刺朝廷。几天后,“新进”之一的舒亶(当时在御史台任职)也提出苏轼的许多诗中有对皇帝不忠之处。他把苏轼的四本诗集连同奏状一起上送。当时的御史中丞叫李定,曾是王安石的门下,他也写出了一份奏状,列举了苏轼该杀的四条理由,案件很快发交御史台查办。宋神宗的本意不想杀苏轼,不过一些朝臣既已提出,他也就顺水推舟,让御史们查办去了。

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友,亲自出版过苏轼的诗。他首先听到了消息,

急派信使驰往当时在南京的苏轼弟弟苏辙。苏辙又派信使紧急通知苏轼。而御史台的官差也带着兵丁快马前往湖州，拘拿苏轼。

苏轼被拘押到京城，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御史台被称为“乌台”，（《汉书·朱博传》中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鸟数千栖居其上，因称御史台为“乌台”）苏轼以诗犯案，被关押在御史台，故称为“乌台诗案”。

当时御史们作为主要“罪证”材料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今已不传于世，但宋代晚于苏轼的陆游搜集了他被审判的全部材料，宋人周紫芝《诗谪》和清人张鉴秋的《眉诗案广证》也都对此案有较详细的记载。

苏轼被指控为有罪的诗约有几十首，具体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诗人没有任何讥讽诽谤之意，对他的指控完全是凭空诬陷、穿凿附会的。其中有一首是苏轼写的《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之四：“吴儿生长狎涛渊，昌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舒亶第一个出来指责这首诗是专门用来攻击神宗皇帝的“水利法”的。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很是通俗易懂；生长在吴地的人很喜欢赴海弄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以求“利物”（彩物）。皇帝新近下旨禁止开潮，假如东海龙王能领会明主之意，一定会让沧海变桑田的。舒亶说，这首绝句的后两句反对农田水利法，矛头直指“明主”，完全是曲解诗意，别有用心。御史们攻击苏轼的还有一首诗是描写两棵老桧树的，诗中写道：桧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们认为这是侮辱皇帝，因为龙一直都是皇帝的象征，而龙只能在天，怎么能在九泉之下呢？甚至有人说，苏轼这样写诗是有意谋反。他们为了除掉苏轼，肆意曲解苏诗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不过，苏轼确实写了一些批评新政的诗篇，这属于另外一类，对这一点，他也供认不讳。他的知交刘恕被罢出京，苏轼写了两首诗对当朝新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另外，他在给王诜驸马等人的诗中，也多次对新政扰民表示了强烈不满。但这批评也仅仅是抒发了一点心中的郁懣，远远谈不上诽谤朝廷。

苏轼在狱中被反复提审逼问，他自度可能是活不成了，就写下了两首绝命诗托一位同情他的狱卒梁成交给苏辙，其中第一首，有这样几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苏辙看到哥哥这两首诗，伏案痛哭。他哭完后，并没有收下，而是

让狱卒将诗送交官府，想办法转到皇帝手上。后来皇帝果然见到了这两首诗，读完后，大受感动。

这时，宋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范镇等许多元老重臣都出面营救。有一位叫章惇的人，是变法派的中坚人物，在朝廷中占有显位。他曾是苏轼的朋友，后来也是迫害苏轼最狠的政敌，但在那时却极力为苏轼开脱。最后，还是当时已经下野的王安石站出来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场轰动全国的“乌台诗案”才这样“一言而决”。苏轼大难不死，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条件是“限任”该区，不得擅自离开。

苏轼由八月十八日被捕入狱到十二月二十日除夕前出狱，一共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但苏轼旧习难改，一出狱就写了两首诗，其中的第一首中写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第二首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出名声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尽管蹲了一百多天的大狱，但苏轼照样敢想敢说，他作的这两首诗照样语含讥讽，按他自己的话说，这真是无可救药。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到黄州上任。黄州远离京师，“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但他在这里得到了知州徐君猷的友善招待。长江对岸的武昌太守姓朱，也常送一些酒菜给他。苏轼刚刚从大牢里出来，死里逃生，处事自然就格外谨慎。他的朋友陈慥约他去武昌作客，他谢绝说：“恐好事君子，更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的政治环境相当险恶，已到了动辄得咎，几乎被软禁的程度了。

苏轼当时的经济状况也相当窘迫，他在写给秦观的一封信中写道，初来黄州，他没有什么收入，又要养一大家子人，只好痛自节省，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也就是一百五十钱。又用大竹筒贮存一些用不了的钱，以待宾客来时用。

生活如此贫困，但苏轼性爱山水，常常独自一人到山水之间徜徉。有时回来晚了，就与渔夫樵夫相伴，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这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沦落到如此地步，言谈中虽有几分返朴归真的自得，但更多的还是无可奈何的苦闷和失落。

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当地一位叫马正卿的穷书生替他向官府申请了一块荒地，约有十多亩，“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苏轼亲自耕作，

不辞劳苦，希望能给自己困顿的经济状况一点补济。这块荒地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称东坡，苏轼就以东坡为号，称为“东坡居士”。

苏轼一生，儒家的入仕思想和佛老的避世思想始终相互并存。在黄州这一时期，佛老哲学在他的思想上处于主导地位，他闭门思过，不问政事，在与邻里的交往中，过着一种平淡的生活，在此期间留下了许多趣闻。

苏轼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是陈慥。当年，苏轼与陈慥的父亲共过事，但水火不相容，可这并没有影响到苏轼与陈慥的友情。在黄州这一段日子里，他们二人经常相互拜访，开一些玩笑，由于苏轼开玩笑写了一首小诗，陈慥惧内的名声竟然流传千古。苏轼写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勿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从此“河东狮子吼”一词就成了悍妇的代名词。苏轼还经常与一些道士僧人来往，探讨人生的一些玄机真谛。元丰六年，苏轼的妾为他生下一子，名叫遁儿。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自嘲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为自己命运的坎坷而不平，为自己怀才不遇而发着牢骚。他貌似避世，但却始终关心着民众的苦难。与黄州临境的鄂州，“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鰥夫”，这种溺婴恶习，苏轼闻之酸辛，“为食不下”。他提笔给鄂州太守牛康叔（寿昌）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设法革除这种恶习。苏轼还身体力行，成立了救儿组织，请附近诚实博爱的古先生担任会长，他们向富人捐了不少钱财，以帮助那些即将生小孩的家庭。苏轼说：“若岁活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出十千。”

苏轼被贬黄州，生活艰辛备至，文学上却迎来了大丰收。比较著名的有：《东坡八首》《寒食雨》《渔蛮子》，还有传诵千古的前后赤壁赋等等。

元丰七年四月，苏轼改贬汝州，从那时算起，他在黄州已住了整整四年多。他先让长子苏迈带全家到九江等地，他自己准备先到筠州去看望弟弟苏辙。与他同行的一共有三位朋友，一个是陈慥，一个是小他五岁的参寥和尚，还有一位是号称活了一百三十多岁的道士乔同。苏轼在途中游历了庐山，一共写了三首诗，其中一首成为写庐山的最佳诗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的两个侄儿走了八百多里路来接他，苏轼终于见到了离别四年